

March 2021

Urban Imagination and the Idea of the Nation-Stat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Yongdong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Aesthetics Commons](#), [American Studies Commons](#),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Classics Common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mons](#), [Film and Media Studies Commons](#), [Modern Literature Commons](#), and the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Yongdong. 2021. "Urban Imagination and the Idea of the Nation-Stat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1, (2): pp.54-6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1/iss2/6>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

李永东

摘要: 城市和民族国家既是实体性的,也是观念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研究,需要超越只有一个城市和只有一个乡村的观念模式,对现代性和文化视角的阐释限度有所认识,重视发掘城市形象的多义性和流动性。城市与民族国家构成了一个“问题场域”,看待、想象城市的方式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性质。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能够相互照亮。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对城市有着自己的偏好和选择,那些处于内忧外患中心地带的城市,那些被域外文明强势嵌入的城市,或被寄予民族国家崛起厚望的城市,是民族国家话语的聚集地与争讼场。其中,国都、租界城市的文学想象尤其受到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青睐。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需要抓住两个身份,即城市的身份和作者的身份,并引入城市互观的思路和跨国、跨文化的视野,由此拓展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 城市想象; 民族国家; 现代文学; 问题场域

作者简介: 李永东,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通讯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西南大学文学院,400715。电子邮箱: liyongdong2001@sina.com。本文系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半殖民与解殖民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Urban Imagination and the Idea of the Nation-Stat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Cities and nation-states are both substantive and conceptual. The study of urban imagi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eds to go beyond the model that builds on the concept of a uniform city and village. It re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s in interpreting modernit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an emphasis on exploring the polysemy and fluidity of city images. Cities and nation-states constitute a “problem field,” in which the way of looking at and imagining cities are often marked by metaphors of the nation-state. Urban imagination and the idea of the nation-state are mutually illuminative. The expression of the idea of the nation-state has its own preferences and choices for cities. For instance, cities at the center of historical turmoil, those invaded by foreign civilizations, or those given high hopes for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re the sites on which discourses and disputes about nation-state are concentrated. Among them,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national capitals and concession cities is especially favored in the expressions of the idea of nation-state. The urban imagi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an be studied by focusing on issues of the two identities of the city and the author and by introducing the idea of the mutually mirroring cities as well as trans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Through this, the space of the study on urban imagination and nation-state may be expanded.

Keywords: urban imagination; nation-stat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roblem field

Author: Li Yongdong, Ph. D., is a professor at Southwest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ddress: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No. 2 Tiansheng Road, Beibei District, Chongqing 400715, China. Email: liyongdong2001@sina.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of National Cultural Masters and “Four Batches” of Talents Fund.

一、作为问题场域的城市想象

斯宾格勒断言“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83)，“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民族、国家、政治、宗教，所有的艺术以及所有的科学，全都有赖于一种原初的人类现象，那就是城镇”(79)。在近世的文明进程中，城市确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谈论现代国家、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文学，几乎都不能脱离“城市”这一特定的场域。城市，生产并传播一切现代观念和现代之物，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和思想文化土壤。

然而，当我们试图描述一座城市时，总感觉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这是因为“城市现象是一个很难下定义的现实；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潘什梅尔 183)。关于城市的言说，不仅指向城市自身，更重要的是，城市构成了一个松散的“问题场域”(汪民安 1)。任何关于城市的表述，都被拖入现实问题之中，映现着城市人的当下体验或未来愿景。

作为“问题场域”的城市向各个领域和各种意愿敞开。这也意味着阐释城市的路径必然是丰富多样的。实际上存在两个城市，一个是看得见的城市，一个是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城市是物质的、实体的，看不见的城市是心理的、精神的。卡洛·罗特拉提出了“事实城市”(city off act)与“感觉城市”(city of feeling)两个相对的概念，“事实城市形成于资本、材料和人的流动”，而超越城市“实在体”的“感觉城市”则“成型于语言、图像和概念的流动；文学作品通过感觉城市的塑造使得自己想象的城市在读者的头脑中形成意象”(成砚 64—66)。看不见的城市在人们认知城市和民族国家时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实在体的城市。

诸多学者都重视城市心灵、城市感觉、城市印象的伟大作用。涂尔干相信，“每一种城市都创造一种心灵状态”(利罕 8)。袁昌英也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心灵”，巴黎、柏林、纽约、莫斯科、北京，哪一个城市不是有着它“特别的精神与气质”？换言之，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城

格”，“正如人之各有其人格一般”(袁昌英 241)。城市的心灵或城格，使得每座城市可以辨认，也使得城市与乡村截然区别开来。正如斯宾格勒所言，“区分城镇与乡村的东西，不是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城镇的心灵的诞生”是一个奇迹(斯宾格勒 79)。斯宾格勒应该是在观察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现代城市的基础上得出了这一结论。

有别于乡村心灵的城市心灵，近代以降才在中国系统出现。在这之前，由乡土文明主导的传统中国，城市与乡村共享一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里的地主与乡下的地主并无本质不同，在城里做官与解职返乡的士绅在精神生活上也无二致。即便北京这样的大城，在林语堂的记忆中，它的魅力仍在于“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的协调”(林语堂 507)，师陀对北京的深情，也源于它是一个“半农村性质，令人难忘的老城”(师陀 279)。不过，西风东渐后，城乡的协调性已在许多城市被逐渐打破。西洋的现代器物、街道建筑、消费娱乐、价值观念甚至城市制度不断扩散到中国的城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背叛乡土文明作为代价的。城市的心灵，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语境下追求现代化的产物。城市出现了新的机构和职业(学校与教师、报刊与编辑、现代工厂与资产阶级、银行与银行家、教堂与传教士，以及自由作家、医生、律师等)，新的城市空间(公园、电影院、咖啡馆、跳舞场、运动场、博物馆、百货公司、摩天大楼等)，管控城市的权力机构除了中国地方政府，还有领事馆、工部局等外国机构。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都存在多元权力格局，华洋杂居，多个权力主体控制着城市不同的区域。城市的空间、人群、物质、生活、权力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使得城市心灵在现代与殖民之间挣扎，民族国家观念参与并影响了关于城市的表述：治外法权、炮舰外交、种族歧视、文化身份、劳资矛盾、经济竞争、崇洋媚外、国家主权、反帝反资、提倡国货、民族本位文化等现实和观念进入城市想象中。城市心灵的出现，使得城市既有看得见的一面，又有看不见的一面。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的研究，需要顾及它的两面。

谁更有能力呈现城市的内外两面，抵达城市的精神深处？显然不是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

政治学甚至历史学的相关著述,这些领域的学者不大关心城市的气氛和灵魂。唯有作家和艺术家才会一边穿越城市的空间,一边捕捉城市的气息,思绪翻飞,为城市描形绘神。城市心灵、城市性格、城市感觉属于心理、精神的层面,难以“看见”,不可量化。而文学恰恰在感觉、精神城市的捕捉和书写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在1998年所著的《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的构形方式,认为城市与文学相互生成,城市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城市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阅读文本“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利罕 9)。作家通过文字构设的城市形象,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艺术之宫”(贾振勇 60),文学中的城市将影响人们对于现实城市的理解与评价,进而介入现实城市的文化定位与形象重塑的工程。例如,时光流转,新时期的上海人却“一定要以‘海派’作城徽”(李天纲 348),这就与文学中渲染的旧上海形象有一定关系。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城市看作是文学想象的产物”(利罕 383),尤其是当城市被当作民族国家观念的隐喻时,如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上海作为“地狱”或“天堂”,抗战大后方文学中的成都“像北平”或“像江南”,都可以被视为民族国家观念参与城市形象建构的结果。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40)文学创造城市的方式就是城市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南京、重庆、上海等城市,就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像的混合物”(陈平原 5)。想象城市的过程,也就是为城市编码赋义的过程,混合着体验、感觉与虚构,并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特征。

讨论城市想象,我们习惯于从城乡二元格局来思考。“由于城市将它的对立面竖立为乡村,那么,城市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城市内部的差异——无论是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还是一个城市自身的历史差异——就可以忽略不计,城市在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共同属性。似乎只有一个城市,也只有一个乡村。在此,城市通常被看做是现代性的一个载体,甚至有时候,它就是现代性本身。”(汪民安 5)城乡对照的审视方式,固然有利于检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转型,辨析文明观

念的生发方向,指陈都市病的症状所在,也足以彰显城市的整体形象,但是难以真正揭示“这一个”城市的形象特质。

“现代性”观念把城市与乡村区别开来的同时,也遮蔽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在探究城市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我们常常把“现代性”当作似乎可以被量化的标准,以此考察现代传媒(报纸、杂志),现代场所(学校、电影院、公园、百货公司、跳舞场、咖啡馆等),现代交通和通讯(电车、汽车、电话、电报等),现代物品(电灯、洋装、高跟鞋、留声机等),现代观念(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男女社交、消费主义等)在中国各个城市出现的时间、存在的规模以及引发的冲突。无论是民国首都、内地城市还是通商口岸城市的文学想象,无一不是为了印证该城市“现代性”的程度和比重。“现代性”既被看作论述的起点,也是论述的终点。以同一“现代性”来审视各个城市,所造成的印象就是“近代中国似乎只有一个城市”,或者只有两个城市——传统城市与现代城市。以“现代性”的标准考察城市,既揭开了城市现代化的神秘面纱,也模糊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区别。因此,需要引入地方性视野和民族国家观念以打破城市形象趋同的分析模式。30年前,黄万华针对沦陷区文学的研究状况,就提出应重视文化环境的考察,辨析相异的地区性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黄万华 168—170)。同样,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只有充分考虑到城市的身份(如:国都、租界、大后方城市),进入具体的城市布局、权力结构、阶层关系、社会心理、个体记忆,把人与城的对话语境落到实处,并以“他城”作为参照,才能避免“现代性”的阐释陷阱,揭示每个城市文学想象的特定风貌和精神追求。

每个城市的形象,自有其标示性的特征,这些标示性的特征使得它的面孔具有辨识度。“可识别性是城市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可识别的城市就是它的区域、道路、标志易于识别并又组成整体图形的一种城市”(林奇 2)。正因为此,无论是作为实体性的城市还是想象性的城市,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上海、北京、南京、重庆、天津形象,在言说中都不会被混淆。不过,这多少属于本质主义的城市观和写实主义的文学观,这种观点认为存在一个个固定的、特殊的城市形象,有待作家摹写和表现,也有待评论家解读和提炼。确实,

从人文传统、地方性格、自然环境和区域格局等因素构成的文化视野来考察各个城市的文学想象,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城市文化视角是一种求同的视角,它确证而不是偏离多数人关于某个城市的经验和印象。因此,文化视角应当作为城市想象研究的重要视角,但也应警惕以“整体”的城市文化眼光来裁定风貌各异的城市书写。

实际上,在文学想象中,城市形象的整体一致性并不是作家追求的目标,“城市繁复而多样,个人只能摸索到城市的片段,只能摸索到自己的城市”(汪民安²⁾。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夏衍《上海屋檐下》、茅盾《子夜》都触摸到了上海的城市面影,但又如此不同。以“整体”的城市文化眼光来打量所有创作,显然缩减了城市形象的丰富性。而且,民族国家事件会不断重塑城市文化。中外条约、革命、战争、迁都等民族国家事件会修改城市风貌,给城市文化添加新的内涵。在文本内外,首都的兴废,战略中心的转移,城市设立外国租界,或划入租借地,或割让为殖民地,或成为大后方重镇,会迅速改变城市的文化性质和空间面貌。例如,首都北京和废都北平,租界城市与其他城市,在文化精神上就有较大的区别。在通俗小说《人间地狱》(1924年)中,妇人管上海公共租界叫“大英地界”(娑婆生 包天笑³⁾,就连郭沫若初到上海,也感觉像“初到了外国的一样”(郭沫若¹¹²⁾,外侨走进租界,反而感觉像走进“自己的城镇”(郑曦原编⁶²⁾。这是租界、殖民地城市才会造成的民族国家归属的错觉和主权意识的僭越。同为租界或租借地区域,也因租占国不同带来城市文化的差异,号称“九国租界”的天津,其城市文化就夹杂着英、法、日、德、俄、意等国的异国情调。因此,从城市文化视角来研究城市想象,我们需要厘清城市的民族国家占位所带来的文化差异。

从城市文化的角度解读城市想象,我们能够把握到城市相对固定的印象,但是在把握各个作家与城市对话的特殊方式上,却有点力不从心。凯文·林奇认为“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种公众印象。它是许多个人印象的迭合。或者有一系列的公众印象,每个印象都是某些一定数量的市民所共同拥有的。”(41)但是,如果仅仅把城市想象看作是为了印证“公众印象”,显然低估了文学创

造城市的效用。

固然,每个城市皆有其特殊的形象,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文学城市的面孔是固定不变的。城市想象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具有解释甚至发明“一个城市”的话语力量。正如科林·麦克阿瑟所言:“城市(亦即所有都市空间,甚至是‘自然’景观)总是关乎社会心态与意识形态,它深受叙事的影响,不断在定义与重新定义乌托邦或反乌托邦(dystopias)的游戏中,调整自己的定位。因此,城市在不同的言说中摆荡,它不具绝对、固定的意义,而是暂时的定位之一而已。”(24—25)在不同言说中摆荡,不断对城市形象进行定位,体现了城市想象的多义性和城市形象的流动性;不同主体与城市对话所生发的民族国家观念,也处于变动之中,北京、南京、重庆等城市的想象莫不如此。

中国现代文学中城市形象的流动,除了受“实体性”城市现实变迁的影响,亦是时代风云、书写立场、文化趣味和观察角度等差异性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城市形象与时代语境、作家旨趣之间有着相互发现的关系。时代语境和作家旨趣影响了文学城市的风貌和气质,从城市风貌和气质的描摹中,可以捕捉到时代的律动以及作家的态度。作为时代之子的作家与城市的相互发现,是一种动态关系。无论上海、天津,还是南京、重庆,其文学形象皆处于因时而变的状态,时代心理、文化变迁和政治动向的巨手操纵着作家想象城市的方式。在袁昌英先后写下的《游新都后的感想》和《再游新都的感想》中,首都南京呈现出从“新都”到“迷城”的形象蜕变。时势变迁,作家所聚焦的战时重庆的标志性空间,由“精神堡垒”转换为“曾家岩50号”(丁玲^{31—32}),从而完成了对重庆形象的清洗和重构。魔都上海更像一位百变女郎,从包天笑《上海春秋》、茅盾《子夜》、刘呐鸥《都市风景线》、张爱玲《金锁记》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民国上海的多副面孔。与其说城市有多副面孔,不如说作家想象城市有多种眼光。与城市关系的远近和情感的深浅,也会影响所“看见”的城市样态“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她又是另一种模样。”(卡尔维诺¹²⁶)人与城的关系,包含我们对国家现实政治状况的态度。茅盾《腐蚀》(1941

年)与老舍《陪都赞》(1942年)所构设的战时国都形象如此不同,以致我们会怀疑:两位作家书写的是同一座城市吗?显然,城市想象很多时候为作家立场与特定修辞所操纵。从未到过重庆的当代中国人,对抗战时期重庆的认知,大概摆脱不了由“白公馆”“渣滓洞”所编织的一套政治话语,而“战时国都”的形象则在语言、图像和概念的流动中大幅度折损。说到底,城市是一个问题场域,城市想象汇聚、释放了各种心理、观念和趣味。而民族国家观念更是经常渗透到城市想象之中。

二、观念建构的民族国家

现代城市的文学构形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都是国家和城市被“打开”的结果。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门被打开,城市亦被打开。传统中国城市有城墙和护城河,空间封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中国城市都曾如此。现代城市是敞开、流动的。在殖民入侵和中国主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城墙被拆除。最早拆除的是天津卫的城墙,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拆除了天津城墙,在原城墙的地址上修筑了四条马路。1906年,汉口城的城墙开始拆除,并修筑马路与毗邻的英租界相连。1912年,上海县城的城墙拆除,并在城墙的地址上修筑马路,电车可以由法租界直通华界,华界与租界在空间上相互敞开。拆除城墙,敞开城市,是民族国家在世界文明竞争的格局中所采取的城市空间调整策略,由此,城市成了中外交流、较量的场所和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空间。

梁启超感叹历朝历代的“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他认为国家思想体现在“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和“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梁启超 24—35)。传统的忠孝观念使得中国人有家、有朝廷,而不知国家。在世界交通、“天下”转变为“万国”之前,华夏中心观阻碍了从“国家”层面对外族和世界的认知。国门、城门打开之后,在中国城市中才普遍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根据条约在中国城市内部设置领事馆,辟设租界,开公司,建工厂,办报,驻兵,传教,这一系列的举动,使得外族、外国进入中国之内,进入城市之中。城市的新现实教给了城市人“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和“对

于世界而知有国家”的观念。

“民族国家观念”是指对自我民族和国家的情感、立场和认识,并涉及对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要理解“民族国家观念”,首先得厘清“民族国家”概念。“民族国家”是由“民族”与“国家”两个词语组合而成的概念。二者的意思是有区别的,孙中山认为“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孙中山 186—187),西顿·沃森把“国家”看作“法律上的政治性组织”,把“民族”看作“某类人群的共同体,其成员依靠团结观念,共同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结在一起”(1)。杨剑龙、陈海英对“民族”与“国家”概念作出了更清晰的区分:“从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可看出,民族更多偏重于地域、文化及心理认同,是一个文化学、人类学的概念”,“而国家更多偏重于地理、政治和军事,通常来说一个完整的国家必须包含主权、领土和人民三要素,是一个政治学上的概念”(杨剑龙 陈海英 1—11)。从词语结构来看,“民族国家”可以看作并列结构,也可以看作偏正结构。看作并列结构时,“民族”与“国家”各有其意义指向,二者在文化与政治实践中可分可合。看作偏正结构时,“民族”是“国家”的限定词,民族国家“特指国家形态中的一种,作为一种特定的国家形式,它是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1—11)。因而,“民族国家观念”既可理解为关于“民族”和“国家”的观念,也可理解为关于“民族的国家”的观念。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从国家性质看,“国家”前面是否需要加上“民族”来限定,尚存在争议。张中良就认为,以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来框定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并不合适(张中良 11—12)。但是,在现代思想与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知识分子和权力组织频繁地借用民族话语来反帝反殖,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凝聚国家向心力,确立政党权力的合法性。因此,讨论城市想象时,使用作为观念建构的“民族国家”概念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对“民族国家”的理解,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中外学者在理论上对“民族”和“国家”概念的阐释,观点纷呈。对“民族”的定义,可以区分为强调客观因素(如语言、身体、习惯、宗教、地域

等)和强调主观因素(如情感、性格、认同等)两种类型(史密斯 11)。就客观因素而言,血统、历史、文化和语言等通常被认为是确定一个民族的基本要素。孙中山把民族的形成“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孙中山 188)。吉尔·德拉诺瓦认为“自身,承袭某一血统、生于某一地、某一语言,甚至某一道德:这些就是民族的词源学组成部分”(6)。就主观因素而言,最流行的看法为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把“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6),认为“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45),使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得以实现。安东尼·史密斯则兼顾主客观因素,把“民族”定义为“具有名称,在感知到的祖地(homeland)上居住,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与众不同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法律与习惯的人类共同体。”(13)客观、自然的民族观与主观、建构的民族观,以及主客观融合的民族观,在近世文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皆有其现实依据,也各有其理论限度。自然出现的、由出生所决定的民族特征,在城市中形成了黄种人与白种人、华人与洋人、中国人与日本人相分的观念现实,构成了城市人群在文化接触时自发的、原初的情感和立场。“城市经常以换喻的方式现身,比如体现为人群。我们通过人群看见城市。”(利罕 10)城市人群的构成与权力关系是民族观念通常的现身方式,现代作家对之的叙述态度基本一致。

民族观念所具有的文化活力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强势参与,是在“民族”成为一种“主义”之后才发生的。“民族主义”有着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三个基本目标,可以定义为“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史密斯 9)当“民族”被看作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政治团体,进而与国家、政党、阶级等政治组织以及近代殖民运动相关联时,“民族”就成了一个聚讼不已的概念,城市则成了民族话语的角逐场。民族主义主要是对外的情感和观念,而现代城市是中外民族接触的主要地带,在日常生活和各类空间中都可感受到华洋冲突和民族屈辱。这就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所包含的民族主义观念混合着自贬与

自尊、改造与复兴、仇外与媚外的态度。中外民族在身体、语言、习俗、信仰等自然属性和文明观念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外侨的种族歧视和殖民霸权,激发、培育了城市人群复杂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因而构成了城市想象的重要情感和观念来源。萧乾的《皈依》、彭家煌的《Dismeyer 先生》、朱自清的《白种人——上帝的骄子》、郭沫若的《月蚀》、陶晶孙的《毕竟是个小荒唐了》等作品,在民族意识与殖民话语的交织中,叙述了民族压迫和文明冲突中的个人境遇。

然而,中外人士和中西观念在城市的交流碰撞,也扰乱了城市人群原初的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语言、服饰、生活、习惯、信仰等作为民族“共享的特点”,在民族内部一些成员身上(如:新式知识分子、买办、西崽、华人传教士)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变更,变更的结果是向(欧美)异族靠拢,民族主义因此不仅面临对外的问题,也面临内部分化的问题。可以说,正是民族主义把民族卷入文化共同体建构和国家权力分配的竞争中,从而成为推动中国近百年来变化的“一个最大的动力”(余英时 13)。

“国家”是难以描述的,因为“我们从来无法实实在在地看见国家。我们最多可以看见‘政府’这个具体个人的聚合,它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表示着国家的存在”(温特 213)。有学者从法学角度对“国家”和“政府”进行了区分,认为“政府根本是和国不同的,因为前者是许多官吏的集合体,而后者是包含社会或民族的政治状况的一种假定的实体”,是“一个集合的人”,“是必须由我们的自觉加诸我们的一种总合”,“国家本身,除被认为一种法律的或政治的实体外,没有实物”(萨柏恩 许派德 19—20)。《社会中的国家》一书把“国家”既看作具有凝聚力与控制力的观念,又看作“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实践”,并指出二者之间存在裂隙和抵触。“国家观念暗示了一种单一的道德体系,一种标准模式,一种做事的正确方式;而实践则意指多种表现类型,以及可能包含许多关于什么是正确行为方式的观点。”(米格代尔 19—20)陈独秀也看到了“国家”意指的裂隙,他从阶级革命的立场指出,在一个国家中,“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之存在,抽象的整个国家是不存在的”(陈独秀 32)。正因为“国家”的抽象性,文学就能发挥语言的魔

力,把国家加以人格化、情感化和形象化,以城市来隐喻国家即为其中的一种方式。这与现实中城市的国家隐喻相互促进。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曾对城市空间进行国家隐喻化的改造。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着手改造北京,打破帝制时代北京的封闭空间结构,解除皇权在道路、城门、园林等空间的独占权力,向公众开放,通过空间的解禁来宣传民国新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国民党政府通过在南京建造中山陵、中山路,把党国观念寓于城市空间格局中;国府迁渝后,又在重庆建造“精神堡垒”,以民权路、民生路、中华路、中山路等名称对街道进行重新命名,以彰显战时国家观念;在上海,国民党政府则试图通过确立空间的优越来对抗西方的空间殖民主义。(李永东,《租界文化语境》98—99)

作为观念构设物或人格化的“国家”需要通过历史追溯、政治宣传、文艺表现等来建构。尽管统治集团希望各类文本强化国家观念的凝聚力与控制力,但“国家即一个争议的场所”(加拉尔等6)。对于文学分析与城市研究而言,恰恰需要在观念的差异和冲突中寻找其背后的意图,以捕捉文学的动向和社会的思想结构。因此,城市想象所指向的相对意义上的国家,更值得关注。正如《近代国家观念》的两位英译者所指出的那样,“国家是一个相对的名词,这是很明白的。在团体内还有团体,每个团体以一种关于正义的同意为标志”(萨柏恩 许派德 57)。一些分歧和例外的情形,往往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如左翼作家、通俗作家、自由知识分子想象上海时家国观念的分野,再如天津租界的“小洋鬼子”把祖国当他国的特殊情形。(李永东,《他乡即故乡》26—47)在城市想象中,“国家”与“城市”一样,是一个问题汇聚场和观念触发器。

国家比较抽象,普通民众难得有切己感,而民族能够“使用生物隐喻来赋予社会存在以生命的、有机的色彩”(德拉诺瓦 15),因此国家观念经常借用民族的生物隐喻和文化认同机制来表达,把国家危机、生存的问题转换为“民族危机”“民族生存”的问题。“民族”涉及祖先、血脉、语言等共同的记忆和与生俱来的特点,以及个人对土地的情感,故能有效激发国民的文化认同、患难与共的感受。民族主义在近代主要作为政治观念与实践而存在,用于排满、反帝、革命、独立自强、

国家统一等政治行动,其目的在于建立、巩固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之所以甘愿被国家观念征用,不仅缘于殖民时代的种族说深入人心,亦表现为近代的社会革命和国家建构一直宣传民族主义,而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征用,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家国一体”观念,由家族而民族而国家,构成了完整的情感和语意逻辑,在特殊的语境尤其是战争年代,这种情感愈发深厚。

但是,“民族”也潜藏着拆解“国家”的力量。正如吉尔·德拉诺瓦所指出,“若没有与高于民族概念的政治目的,如政治平等和公共自由等结为一体,民族观念传播的机制或许会以更快、更深刻的方式分裂世界”(8—9)。孙中山领导的近代革命因此把“驱除鞑虏”与“恢复中华”“建立民国”联系在一起。当“国家”与“民族”结盟,国家内部的矛盾则暂时退居其后,尤其是国家安全受到外部威胁时。这时,“国家”在表意上可以向“民族”滑动,正如“中华”与“中国”存在复指关系,“国家”从而隐含了民族的凝聚力,通常“用于遮蔽次于国家层次的冲突:种族或人种群体之间的冲突,地区之间的冲突,或围绕权力或意识形态问题的冲突”(加拉尔等 6)。这也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大力提倡民族主义的原由,想以此消除军阀割据和阶级斗争问题,稳固中央政权,推进党国一统。而左翼知识分子正是以阶级观念来洞穿民族主义的欺骗性,他们意识到“国家”与“民族”的观念结盟后对阶级意识的遮掩,故左联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即宣告“中国的工人现在没有祖国”,“只有苏联是我们的祖国”,并号召中国的士兵、工人、农民反对“自己民族的政府,自己民族的豪绅地主阶级”,同时“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进而“创造自己的祖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 2—5)。

在反殖民、无产阶级革命、种族主义、世界主义、中华复兴、全面抗战等观念的裹挟之下,现代知识分子关于民族国家的思考生发出繁复的观念形态,这些观念形态与城市想象之间构成了相互促进、相互质询的关系。

三、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相互照亮

美国城市学家伊利尔·沙里宁曾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

上追求的是什么。”⁽¹⁾对于民国时期聚集于城市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文化追求、城市体验和文学想象,不可避免为民族国家观念所裹挟,因为外国势力的干预和民国政权的性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诸多城市的崛起缘由与所处境况。

首先,帝国主义势力主要盘踞于条约口岸城市。城市发展际遇和权力结构的新形态,与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条约体系”有密切关系,“中国城市近代化是与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的”(隗瀛涛主编 9)。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宁波、九江、青岛、威海、烟台、旅顺等条约口岸城市,“是文化共生现象的产物,是西方的扩张与成长的面海中国的力量的结合点”,其最现代化的区域“主要由外国人治理但主要由中国人居住”(费正清编 25)。老舍《猫城记》中的猫城存有无处不在的外国观念和殖民力量的强势干预,隐喻了被“条约体系”拖入虚弱溃败境地的民国。无论是以反帝反殖为旨归的民族主义事件,还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近代革命,都集中发生在中央政权难以控制的条约口岸城市。正是帝国势力和西方文化在条约口岸城市的扩张,不断激发和巩固了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所有的民族主义要求都表现出外国的影响”(29)。自清末民初起,由于这些城市“已成为技术革新和政治颠覆的焦点,而脱离了中国城市的传统。这一双重演变是由外国人的到来所引起的,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法,并且在他们的租界的庇护下谴责帝国政府的暴虐与无能”(813)。殖民政策、民族革命和国家现代化,被编织进城市的历史进程中,使得这些城市的体验和叙事获得了民族国家层面的意义。无论熊佛西的独幕剧《当票——汉口租界虐待华工的写真》(1925年)、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郑伯奇的散文《深夜的霞飞路》(1933年)所构设的反帝、启蒙和革命主题,还是现代作家被民族身份困扰的城市书写,如天津青年处理骚扰的方式(焦菊隐《租界里》),乔装成洋人游上海公园的屈辱体验(郭沫若《月蚀》),西洋女子坐电车的傲慢心态(彭家煌《教训》),都未脱离城市、殖民与民族国家的书写框架。

其次,民国政府是一个依托于城市而存在的政权,城市也因此成了建构民族国家形象、铭刻国家象征符号的重要空间,以及引发阶级矛盾和民

族冲突的中心场域。南京政府“从来没有牢固掌握住中国的农村社会;它控制的地区基本上限于城市地区”,“例如以财政而论,南京政府的岁入几乎全部从现代城市经济部门中聚敛而来,从传统的农村地区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小科布尔 16)。南京政府主导的现代化事业,以及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几乎只在城市展开;城市也是革命家、政治家活动的中心舞台,民族国家事件和反帝运动,如五四、五卅、抵制洋货、收回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主要发生在城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日军的军事占领和殖民控制,也主要局限于城市及交通线。因此,城市的变迁史可以看作近代中国的缩影,百年中国历史看上海、看天津或看其他城市的说法,表明了城市具有“代表”民族国家的资格。茅盾的《子夜》(1933年),就以上海这一座城市的“形象的表现”,来诠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性质”(茅盾 482)。

最后,在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上,城市比乡村更有优势。就文化性质和启蒙关系而言,乡村是被城市唤醒的对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首先是在城市展开,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以背离乡土传统作为价值指向,城市成了“现代”的代名词。同时,城市是全国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外势力对抗、中西文明碰撞、新旧文化交锋、劳资矛盾冲突的前沿和中心地带。因此,城市比乡村更适合成为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空间,体验、看待、想象城市的方式也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性质。熊月之考证孙中山与上海的关系时指出,“在近代中国,一个人的上海观,往往不只是对一个城市的看法,而是其政治观、世界观的折射”(熊月之 7—10)。不仅上海,在现代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其他城市亦如此。

以上三点决定了现代作家的城市想象会自觉不自觉地引向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作家对城市的文学想象,不单是为城市赋形的问题,还常常融入了关于国家政治、民族命运的思考,造成了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在文学中频繁会叙。在研究中,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能够相互照亮:民族国家观念为城市想象研究提供了特别的视角;城市的文学想象则为探究民族国家观念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研究是近二十年的热点话题,涌现了诸多重要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也

留下了可供继续拓展的空间。首先,相关成果大多以“现代性”作为评析的尺度,并采取“现代与传统”的比较视角来看待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简化了其对城市与乡村的理解。其次,绝大部分成果未能形成统观的视野与格局,往往针对单个城市、流派、作家,只有少数采取京海并举、沪港合论、江南综观的方式。再次,极少有成果论及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关系。在这少数成果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张鸿声的专著《文学中的上海想象》。该著聚焦国家与现代意义上的上海想象,认为上海想象包含了转喻国家的总体模式(张鸿声 82—84)。张鸿声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进入对上海想象的分析,或者说选择上海想象来谈论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极具历史眼光与学术洞见,从多个维度揭示了上海想象如何充当了民族国家主体性建构的载体。

鉴于城市想象研究的现状,以及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共生互动关系,我们有必要从民族国家的观念视野对天津、重庆、北京、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的文学想象进行探究,以呈现每个城市与民族国家进行对话的独特方式,在比较中探究民族国家观念的常与变,发掘出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相互照亮所带来的深意。

在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上,并不是所有的城市文本都具有同样的优势,实际上,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对城市有着自己的偏好和选择。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那些处于内忧外患中心地带的城市,那些被域外文明强势嵌入的城市,那些被寄予民族国家崛起厚望的城市,是民族国家话语的聚集地与争讼场,比其他城市更加受到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青睐。中心城市是民族国家的缩影,从城市景观到精神追求皆具有代表民族国家的资格。在全国或区域的中心城市中,国都、租界城市的文学想象最易引发丰富的民族国家观念思绪。

国都(首都)是伴随国家出现的产物,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国都与国家之间存在象征、转喻的关系,国都即国家。国民政府深谙这一点,大力宣传“首都之于国,不特为政治上发号施令之中枢,且往往象征一国之团结与进步,一国之文化与建设,国际观瞻所系,全国向心所关”(行政院新闻局编印 2),并因此极其重视国都的形塑,积极充实国都的精神感召力与现代城市气象。1927年,张其昀主张建都

南京,其理由就包括“南京历代建都,皆有民族独立之精神”(张其昀 1—8)。行政院新闻局编印的《首都建设》一书指出,南京“不可不有适应于首都的宏伟气象与未来发展之远大而完善之建设,于是南京之广大的现代化的都市建设乃告开始”(2)。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重视首都南京、战时国都重庆的建设和形塑,显然考虑到了其国家象征意义。与其他城市比较,国都想象包含了更为浓烈的感时忧国、复兴中华的情愫。正因为国都与国家之间的转喻关系,作家对民国国都的感怀才折射出对国家命运与时代动向的思索,充斥着现代化的期冀和社会政治的争议。

因时代语境、国都历史、创作者身份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的国都想象所承载的民族国家观念有所不同。北京想象一直在追求国家现代化和保留民族传统之间徘徊犹疑;南京想象既表现了对国家独立、复兴的渴望,又流露出对以秦淮河为代表的古典诗意传统的衰颓的叹惋;关于战时国都重庆的文学想象,抗战建国是主调,共赴国难的心愿激发了对社会平等的公开诉求,对投机商人、腐败官僚的批判在战时国家的名义下显得义正辞严,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以有别于五四的方式加以处理,家国同构的观念得以重申。北京、南京、重庆的文学构形,体现了国都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相互映射的动态关系。

根据中外条约而开辟、建造的租界城市或租借地城市,是典型的被迫现代性的产物。其发展不是在封闭的中华文化圈中展开,而是由帝国主义势力和异域文明观念所主导,并在城市景观与制度上模仿西方现代城市,上海、天津、汉口、厦门、广州等设有外国租界的城市皆如此。

“城市是无根的”,它的文明形式“可以四处为家”(斯宾格勒 95),巴黎、伦敦、莫斯科等大都市的空间形式和文化观念,可以在上海、天津、汉口、哈尔滨等遥远的东方城市进行复制,制造出东西混杂的城市景观。“东方巴黎”(上海)、“东方莫斯科”(哈尔滨)、“东方芝加哥”(汉口)、“东方瑞士”(青岛)等称号,就是大都市四处为家的结果。被称为“小上海”或“像上海”的诸多中国城市,同样是向大都市致敬的结果。域外的城市文明在中国的外国租界、通商口岸四处为家,或借魔都上海的影响力二度传播,进而带来了新旧文化的角逐和中西文明的冲突问题,民族国家的建构

也因此进入现代与殖民、西化与民族化相纠缠的复杂境地。

租界作为“借来的时空”，其现代与殖民的双重属性既激发，又扰乱了素朴的民族国家观念。在彭家煌的《势力范围》《出路》、郭沫若的《湖心亭》、焦菊隐的《租界里》等作品中，人物穿越华界和租界，产生了穿越国家权力空间和中西文明边界的类似感觉，“华租交界处的神秘”（彭家煌106）正是由租界城市的多重权力主体带来的。身居外国权力庇护下的租界，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观念的生发难以一气贯通。郁达夫留学日本时会备尝弱国子民的屈辱感。在东京时，给他心灵带来最大烦扰的，“是男女两性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郁达夫，《雪夜》306）。留日学生的民族国家体验有着较为清晰的中华与异族、祖国与他国的边界。但是，他们到了上海，民族国家观念的边界变得含混。郁达夫在1925年写道：

我们大家一样的寄住在租界上，在坐外国人的电车，在用外国人的电灯，并且有时候拿起笔来写点东西，还在抄袭抄袭外国人的可以扶助我们的主义的文章。现在寄寓在租界上的中国人，差不多生活境况，都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当大谈国家主义之余，若受旁人一问“你们的国家在哪儿？”有时恐怕要回答不出话来。[……]以国家主义者自命，歌于斯吃于斯，坐高车驷马于斯，觉得有点不大对。（郁达夫，《牢骚》12—13）

郁达夫所指出的国家主义者的尴尬，只是租界体验与民族国家观念的一个侧面，文学中展开的情形要复杂得多。而且，各个租界的发展历史、权力格局以及与邻近中国城市的关系存在差异，想象租界城市的方式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机制也有所不同，有待仔细辨析。

把握各个城市文学想象的风貌，需要抓住两个身份，即城市的身份和作者的身份。这两个身份造就了城市想象丰富而歧异的情形，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隐喻民族国家的路径和方向。国都、租界是城市的身份，作者的身份则由国籍、地

域、民族、阶级等因素所决定。城市、民族国家参与了个人文化身份的生成，反过来，文化身份的混杂或修改也会造成民族国家意识的迁移和重建。郭沫若想象上海、重庆等城市时，人与城的关系中隐含着留日经历带来的文化身份、民族认同的犹疑和焦虑。老舍小说和话剧所构设的北京、重庆、济南的城市面影，对新潮洋派的景观、物品和人物多有嘲讽，对老派市民的文化性格多持体谅的态度，对内战、政党斗争风潮则感到不安和忌惮，其民族国家观念隐藏着满清后裔的隐秘文化心态。对于在租界城市度过童年生活的外侨，或寓居海外的华裔作家而言，他们对中国城市与民族国家的书写，则提供了边缘的、跨界的观念视野，以及由于主体含混而带来的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进退失据。有过天津租界生活经历的两位外侨分别在《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小洋鬼子：一个英国家族在华生活史》中对天津与母国的书写就触及了这种情形。

城市、民族国家作为相互关联的问题场域，包含了不同国度的作家借中国城市书写所展开的种族观念和国家意识的较量，因此，关于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问题，可以置于跨国、跨文化的视野中来打量。中外作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书写，即需要引入这样的研究视野（李永东，《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152—174）。通过“谁的城市”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南京、重庆、北京、天津等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差异情形。例如：同样是对丑恶南京的书写，王平陵、袁昌英、张恨水等党国文人和自由作家的南京想象，包含了民族危亡时刻催生的强烈忧患意识，以及民主政治的希望落空而产生的愤懑，而艾芜、聂绀弩等左翼作家的南京想象则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意识，通过城市的文学构形来动摇甚至颠覆南京政权的合法性。

抓住城市的身份和作者的身份来讨论城市想象，也意味着引入城市互观的研究思路。无论就城市想象还是民族国家观念的探究而言，同时考察多个城市，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比较的视野与统观的格局，这种互观的城市考察视角，能够彰显城市想象的独特风貌，有助于历史地、结构性地把握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就创作来说，城市想象本身就具有互文性的特征——作家总是企图把“这一个”城市的表述

与其他城市区别开来,其他城市的形象总是作为显性或隐性的存在进入作家关于“这一个”城市的想象之中。而且,在城市之间迁徙,是现代作家、文艺机构、文学报刊存在的常态,想象城市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也因此成了一项联络各个城市的系统工程。要理解抗战时期矛盾的延安想象,就应当考虑他离开上海后在香港、迪化、重庆、桂林等地的城市体验和差异性书写,他的《如是我闻》系列散文对大后方多座城市的书写,在政治地理的比较视野下,建构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中国形象(李永东,《风景》108—114)。要理解老舍在《谁先到了重庆》等作品中的重庆想象,需要同时关注他对北平、上海、武汉、成都等城市的态度,以及战时国家观念对他的城市趣味的修改(李永东,《战时》58—66)。城市之间的形象互观和观念互动,通过单个城市形象观察难以全面洞悉,多个城市的研究则可以在城市的互观互动中发现民族国家观念的变迁与分野。

城市的互观不仅发生在城市之间,也包括对一个城市的过去形象与后来形象的比较,同时代与异时代的城市想象,其观念的参差与对照,值得探究。艾略特强调,“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艾略特 2)。当代文学对民国城市的想象,就是城市历史形象的现存性的表现。民国城市的记忆作为一笔遗产如何参与并显明当代观念的建构,历史与此刻在对民国城市的想象中如何辉映出特殊的观念形态,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强度关联,往往取决于城市是否被卷入国家命运与政治风云的中心,是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命运与政治风云所凭借的具体城市随国内外形势而更替,各个城市的文学想象所投射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强弱也在不断变化。十年南京(1927—1937年)、战时国都重庆(1937—1946年)、民国北京(1912—1949年)、清末民初的天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大后方的延安与成都,这些城市的文学想象,都是在特定的年代被民族国家观念集中照亮,尤其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叟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Trans. Wu Ruire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伊塔洛·卡尔维诺 《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Calvino, Italo. *Le città invisibili*. Trans. Zhang M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2.]

陈独秀 《中国的一日》,《中国的一日》第二编,茅盾主编。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31—32。

[Chen, Duxiu. "A Day in China." *A Day in China*. Vol. 2. Ed. Mao Dun. Shanghai: Life Bookstore, 1936. 31—32.]

陈平原 《序一 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4。

[Chen, Pingyuan. "Introduction I: Memory of Beijing and Remembering Beijing." *Beijing: Urban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Eds. Chen Pingyuan and Wang Dewe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4.]

成砚 《读城:艺术经验与城市空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

[Cheng, Yan. *Reading City: Art Experience and Urban Space*.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4.]

帕克斯·M.小科布尔 《序言》,《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蔡静仪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13—21。

[Coble Jr, Parks McLendon. "Preface."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Trans. Cai Jingyi.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5. 13-21.]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Crag, Mike. *Cultural Geography*. Trans. Yang Shuhua and Song Huimi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吉尔·德拉诺瓦 《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Delannooi, Gil. *Sociologie de la nation*. Trans. Zheng Wenbin,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丁玲 《重庆一瞥——西南通讯》,《文艺月报》4(1957): 31—32。

[Ding, Ling. "A Glance of Chongqing: Southwest Communi-

- cations." *Literature and Art Monthly* 4(1957): 31-32.]
-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传统与个人才能: 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年。
- [Eliot, Thomas Stearns.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Selected Essays by T. S. Eliot*. Trans. Bian Zhili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 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 《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文学导报》6—7(1931): 2—5。
-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To Proletarian Writers, Revolutionary Writers and All Young People Who Love Literature and Art." *Literary Guide* 6-7(1931): 2-5.]
- 行政院新闻局编印 《首都建设》。南京: 行政院新闻局, 1947 年。
- [Executive Yuan Information Bureau, ed. *Capital Construction*. Nanjing: Executive Yuan Information Bureau, 1947.]
- 费正清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 [Fairbank, John K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8.]
- 卡洛琳·加拉尔等 《政治地理学核心概念》,王爱松译。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 [Gallaher, Carolyn, et al. *Key Concept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Trans. Wang Aisong.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3.]
- 郭沫若 《创造十年》。上海: 现代书局, 1932 年。
- [Guo, Moruo. *Ten Years of Creation*. Shanghai: Modern Book Company, 1932.]
- 黄万华 《研究沦陷区文学应重视文化环境的考察》,《文学评论》4(1988): 168—170。
- [Huang, Wanhua.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the Occupied Area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Cultural Environment." *Literary Review* 4(1988): 168-170.]
- 贾振勇 《日月不出 烟火何熄——〈狂人日记〉百年祭》,《探索与争鸣》7(2018): 59—67。
- [Jia, Zhenyong. "The Sun and the Moon Don't Come Out, How Can the Fire be Extinguished: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The Madman's Diary'."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7(2018): 59-67.]
- 隗瀛涛主编 《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 [Kui, Yingtao, ed. *Modern Urban History of Chongqing*.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理查德·利罕 《文学中的城市: 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 [Lehan, Richard.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Trans. Wu Zife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李天纲 《文化上海》。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 [Li, Tiangang. *Cultural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1998.]
- 李永东 《他乡即故乡, 故国亦他国: 论洋鬼子的天津租界记忆与想象》,《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 19 辑。成都: 巴蜀书社, 2016 年。第 26—47 页。
- [Li, Yongdong. "Foreign Land is Homeland, Motherland is Also Their Country: On Foreign Devils' Memory and Imagination of the Tianjin Concession."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Vol. 19.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2016. 26-27.]
- : 《战时国家之城的形象建构——老舍的重庆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文学评论》5(2018): 58—66。
- [——. "Lao She's Imagination of Chongqing and His Idea of Nation State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Literary Review* 5(2018): 58-66.]
- : 《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cession Cultural Context*.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 《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中国社会科学》6(2015): 152—174。
- [——.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Fic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Idea of the Nation-Stat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6(2015): 152-174.]
- : 《风景与矛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天津社会科学》4(2020): 108—114。
- [——. "The Scenery and Mao Dun's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mage at War Time."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4(2020): 108-114.]
-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 《新民说 四》,《新民丛报》4(1902): 1—12。
- [Liang, Qichao. "New Citizen of China (Liang, Qichao): New Citizen Theory IV." *Sein Min Choong Bou* 4(1902): 1-12.]
- 林语堂 《迷人的北平》,《北京乎》下,姜德明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年。第 507—515 页。
- [Lin, Yutang. "Captive Peking." *Beijing: Beijing Depicted by Modern Writers*. Vol. 2. Ed. Jiang Deming. Beijing:

-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507-515.]
- 凯文·林奇 《城市的印象》,项秉仁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
- [Lynch, Kevin. *The Image of the City*. Trans. Xiang Bingren.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90.]
- 茅盾 《〈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81—517页。
- [Mao, Dun. "Before and after the Writing of the 'Midnight'."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o Dun*. Vol. 34.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7. 481-517.]
- 科林·麦克阿瑟 《中国盒子与俄罗斯玩偶——寻找无形的电影城市》,《电影城市》,大卫·克拉克编,林心如、简伯如、廖勇超译。台北县新店市: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3—56页。
- [McArthur, Colin. "Chinese Boxes and Russian Dolls: Tracking the Elusive Cinematic City." *The Cinematic City*. Ed. David B. Clarke. Trans. Lin Xinru, et al. Xindian District of New Taipei City: Lauréat Publications, 2004. 23-56.]
- 乔尔·S. 米格代尔 《社会中的国家: 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 [Migdal, Joel S.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Trans. Li Yang and Guo Yico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2013.]
- 彭家煌 《出路》。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
- [Peng, Jiahuang. *Way Out*. Shanghai: Da Dong Press, 1934.]
- 菲利普·潘什梅尔 《法国》下册,叶闻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 [Pinchemel, Philippe. *France*. Vol. 2. Trans. Ye Wenfa.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0.]
- 伊利尔·沙里宁 《序》,《城市: 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顾启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1页。
- [Saarinen, Eliel. "Preface." *The City: Its Growth, Its Decay, Its Future*. Trans. Gu Qiyuan.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Press, 1986. 1.]
- 萨柏恩 许派德 《英译者序》,《近代国家观念》,王检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9—20页。
- [Sabine, George Holland, and Walter James Shepard. "English Translator's Preface." *The Modern Idea of the State*. Trans. Wang Jian. 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09. 19-20.]
- 休·西顿·沃森 《民族与国家: 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
- [Seton-Watson, Hugh. *Nations and States: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Trans. Wu Hongying and Huang Qun. Beijing: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2009.]
- 师陀 《马兰》,《师陀全集》第2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7—437页。
- [Shi, Tuo. "Ma L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i Tuo*. Vol. 2.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277-437.]
- 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主义: 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2版)》,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 [Smith, Anthony.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second edition). Trans. Ye Jia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奥斯特瓦尔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第2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 [Spengler, Oswald.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Vol. 2. Trans. Wu Qiong.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 孙中山 《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6—426页。
- [Sun, Yat-sen.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he Complete Works of Sun Yat-sen*. Vol. 9.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183-426.]
- 娑婆生 包天笑 《人间地狱》,陈正书、方尔同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Suoposheng, and Bao Tianxiao. *Hell on Earth*. Eds. Chen Zhengshu and Fang Ertong.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汪民安 《如何体验和研究城市》,《城市文化读本》,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页。
- [Wang, Min'an. "How to Experience and Study Cities?" *The City Culture Studies: A Reader*. Eds. Wang Min'an,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1.]
-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rans. Qin Yaq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熊月之 《孙中山与上海》,《历史教学问题》3(1997):

7—10。

[Xiong, Yuezhi. "Sun Yat-sen and Shanghai." *Histo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3(1997): 7-10.]

杨剑龙 陈海英 《民族国家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2011): 1—11。

[Yang, Jianlong, and Chen Haiying.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State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2(2011): 1-11.]

郁达夫 《牢骚五种》，《郁达夫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14页。

[Yu, Dafu. "Five Complaints." *The Complete Works of Yu Dafu*. Vol. 8.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9-14.]

——：《雪夜》，《郁达夫全集》第4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4—309页。

[—: "Snowy Night." *The Complete Works of Yu Dafu*. Vol. 4.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304-309.]

余英时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李世涛主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

[Yu, Yingshi. "Radicalism Versus Conservatism in th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Thought." *Intellectual Position: The Turmoil between the Radical and the Conservative*. Ed. Li Shitao. Changchun: Times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0. 1-29.]

袁昌英 《山居散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Yuan, Changying. *Collected Essays from the Luo Jia Mountain*.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1937.]

张鸿声 《文学中的上海想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Zhang, Hongsheng. *The Shanghai Imagination in Literature*.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张其昀 《中国之国都问题》，《东方杂志》9(1927): 1—8。

[Zhang, Qiyun. "China's Capital Issue." *Oriental Magazine* 9(1927): 1-8.]

张中良 《民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

[Zhang, Zhongliang. *The Concept of Nation-State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2014.]

郑曦原编 《1886年的上海：租界见闻》，《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Zheng, Xiyuan, ed. "Shanghai in 1886: Experience in the Concession." *Memories of the Empire: "The New York Times" Observa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Beijing: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7. 62.]

(责任编辑：赵勇)

